

# 中国农民多维福祉的结构与特征分析<sup>\*</sup>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王思博 陈秋红 李冬冬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利用“个体特征”、“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环保行为习惯”、“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社会公平感评价”、“社会治理参与特征”八个潜在变量构建中国农村居民福祉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对中国农村居民福祉结构进行剖析与评价。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八个潜在变量对农村居民福祉的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体特征”、“社会公平感评价”与农村居民福祉间的路径系数为0.46、0.39,两者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程度较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治理参与特征”与农村居民福祉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2、0.09、0.06、0.04、0.03,它们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程度较弱;“环保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福祉影响的传导路径系数为-0.01。政府在制定改善农村居民福祉相关政策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治理参与特征”等福祉结构中薄弱的方面,消除“环保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福祉的扭曲激励。

[关键词] 农村居民 福祉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19)—06—0008(07)

[作者] 王思博 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市 102488

陈秋红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市 100732

李冬冬 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市 102488

## 一、引言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农业税和实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进行工业化积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未得到应有重视。进入21世纪后,中央政府做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重要部署,“三农”工作被确定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的转变。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增收”向“福祉”转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出现了“幸福”这个关键词,提出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农村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环境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与公众参与机制”(编号:15CGL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陈秋红系本文通讯作者。

居民福祉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二、文献综述

福祉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估中，福祉水平已经成为 GDP 的一个补充测量指标，福祉的测量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目前，已经形成了多种国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欧洲晴雨表调查指数（Euro-barmeter）、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等。在社会科学领域，福祉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表述偏好（SP）与主观福祉（SWB）两种。<sup>[1]</sup> SP 调查要求基于幸福的“基本方面”，引入权重、非市场商品价值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全面、客观的测度，多用于宏观福祉水平的测量。<sup>[2]</sup> SWB 调查基于三点或五点式，例如询问被调查者“总体而言是否感觉幸福”，选项设置为非常幸福、幸福、不幸福时为 3 点式，选项设置为非常幸福、幸福、一般、不幸福、非常不幸福时为 5 点式，<sup>[3]</sup> 主要开展微观数据调查，虽然 SWB 调查的精确性会受到预设幸福指数的函数分布是正态或者左偏的影响，<sup>[4]</sup> 但是，这种简单的福祉测量方法具有可靠性与可比性。<sup>[5]</sup> SWB 调查已经成为福祉测度的主流方法，盖洛普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均采用此种调查方法。

福祉经济学研究始于收入与福祉间的关系研究，福祉经济理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最早见于 1974 年“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sup>[6]</sup> 由于经济学逐渐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发生融合，形成了诸多交叉学科，福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应扩大，已经拓展到消费、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人居环境等领域。<sup>[7]</sup> 基于圈层理论，学者将影响福祉的因素划分为个体、亲人、熟人、生人和自然环境五个圈层，这些圈层均会对福祉水平产生影响。<sup>[8][9]</sup> 可见，福祉影响因素构成复杂多样，有必要对福祉结构进行多维探讨。

在中国农村居民福祉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文献中，有学者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四川灾区与非灾区农村居民福祉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福祉有正向影响，男性农村居民的福祉显著低于女性，而年龄与受灾区农村居民福祉呈“正 U 型”关系，年龄对非受灾区农村居民福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up>[10][11]</sup> 有学者利用排序选择模型，从多个层面分析了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因素，认为年纪较长或未婚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比年纪较轻者、已婚或离异群体高，收入增长、参与村庄治理机会增加、垃圾与污水处理公共设施的完善、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均对农民福祉存在积极影响。<sup>[12]</sup> 聂鑫（2013）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镇化失地农民福祉展开的研究发现，工作状态和补偿公平是影响失地农民多维福祉水平最重要的两个因素。<sup>[13]</sup> 还有文献围绕民主、健康状况、就业质量、公共服务等领域，对农村居民福祉进行了针对性研究。<sup>[14][15]</sup>

虽然研究中国农村居民福祉的文献较多，但对农村居民福祉展开综合性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农村福祉的文献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模型构建形式单一，缺少潜在变量，无法实现潜在变量对福祉综合影响的测度；其次，引入变量不够全面。囿于 Logistic、Probit 等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无法实现对每一层次变量与福祉之间关系进行测度。基于此，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较全面地引入有关影响因素，系统解构农村居民福祉，力求为相关政策方针制提供参考。

## 三、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模型构建

###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CGSS2013 年数据，问卷共分 A、B 两卷，B 卷中不包含“公共服务”部分内容。因为本文涉及公共服务满意度、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故排除了 B 卷样本数据。由于研究对象为农村，故筛选出户口登记状况为“农业户口”或“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且受访者居住类型为“农村”、“市/县城的边缘地区”或“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的样本。同时，排除少量存在数据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样本，最终获得 1799 个有效样本。

### 2. 变量测量与描述

（1）因变量的测量。基于福祉测度通用的

SWB调查方法,选取观测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 $y_1$ ”(即中国综合社会调查A卷中序号A36对应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测度内生潜在变量“农村居民福祉”,具体赋值为:1~5分别代表非常不幸福、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幸福、非常幸福,共五个等级。

(2) 自变量的测量。依据前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兼顾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可得性,引入个体特征、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环保行为习惯、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社会治理参与特征8个潜在变量下的25个观测变量为自变量,变量选取与描述如下:选取性别 $x_{11}$ (0表示女,1表示男)、年龄 $x_{12}$ (受访者2013年实际年龄)、文化程度 $x_{13}$ (1~13;1表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3表示研究生及以上)、健康状况 $x_{14}$ (1~5;1表示很不健康;5表示很健康)、政治身份 $x_{15}$ (0表示非党员群体;1表示党员群体)、家庭人均收入 $x_{16}$ (受访者2012年家庭实际人均收入,单位:元)、家庭相对收入 $x_{17}$ (1~5;1表示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5表示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共7个变量为个体特征 $x_1$ 的观测变量。选取公共服务充足满意度评价 $x_{21}$ 、公共服务分布满意度评价 $x_{22}$ 、公共服务便利满意度评价 $x_{23}$ 、公共服务普惠满意度评价 $x_{24}$ (1~5;1表示非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共4个变量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 $x_2$ 的观测变量。选取中央环保工作评价 $x_{31}$ 、地方环保工作评价 $x_{32}$ (1~5;1表示片面注重经济发展;5表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共2个变量为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 $x_3$ 的观测变量。选取社交串门频率 $x_{41}$ (1~5;1表示从不;5表示非常频繁)、与亲朋关系的密切程度 $x_{42}$ (1~5;1表示非常不密切;5表示非常密切)、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x_{43}$ (1~5;1表示非常不信任;5表示非常信任),共3个变量为社会资本特征 $x_4$ 的观测变量。选取垃圾分类行为 $x_{51}$ 、塑料袋回收利用 $x_{52}$ 、环保捐款行为 $x_{53}$ (1~3;1表示从不;2表示偶尔;3表示经常),共3个变量为环保行为习惯 $x_5$ 的观测变量。选取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 $x_{61}$ 、卫生监督

协管满意度 $x_{62}$ 、农村危房改造满意度 $x_{63}$ (1~5;1表示非常不满意;3表示说不清满意不满意),共3个变量为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 $x_6$ 的观测变量。选取社会公平评价 $x_{71}$ (1~5;1表示完全不公平;5表示完全公平)、收入分配公平评价 $x_{72}$ (1~3;1表示不同意;3表示同意),共2个变量为社会公平感 $x_7$ 的观测变量。选取是否参与了村委会选举 $x_{81}$ (0~1;0表示否;1表示是),共1个变量为社会治理参与特征 $x_8$ 的观测变量。

(3)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从统计结果看,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值为3.75,农村居民整体上觉得比较幸福。从分类统计结果看,认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幸福”“非常幸福”的样本分别占1.5%、8.3%、16.2%、61.0%、13.0%。

在个体特征方面,样本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平均为3.6,未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水平。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处于一般水平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占总样本量的80.5%,农村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良好。从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看,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充足、分布、便利、普惠4个特征满意度评价的得分分别为3.08、2.77、3.09、2.95,总体上处于中等满意度水平。农村居民对中央及地方政府环保工作持满意态度的农村居民分别占43.3%、34.5%,其满意程度得分均值分别为3.94和3.61,农村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一般。社会资本特征调查数据显示,社交串门频率、与亲朋关系的密切程度、对陌生人信任程度的均值分别为2.97、3.46、2.66,农村居民对熟悉的人能维持相对较好的人际关系。环保行为习惯统计数据显示,有垃圾分类、塑料袋回收利用、环保捐款行为习惯的农村居民分别占32.4%、77.8%、9.4%,具有垃圾分类、环保捐款行为习惯的农村居民所占比例较低,需进一步推进这两类环保行为在农村的推广。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对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卫生监督协管满意度、农村危房改造满意度的均值分别为3.71、2.97、3.01,农村居民对民生事业建设的满意度普遍较高,对卫生监督协管的满意度最低。社会公平感评价数据显

示, 社会公平评价、收入分配公平评价的均值分别为 3.12、2.21, 农村居民对两者评价一般。社会治理参与特征数据显示, 农村村委会选举的农民参与率为 54%, 外显性、理性无知、理性弃权可能是制约农民社会治理参与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 3. 理论模型构建

SEM 由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两部分构成。构建模型形式如下:

$$\begin{cases} X = \Lambda_x \eta + \delta \\ Y = \Lambda_y \zeta + \epsilon \end{cases} \quad (1)$$

设定结构模型如下:

$$\eta = B\eta + \Gamma\zeta + \zeta \quad (2)$$

(1) 式和 (2) 式中,  $\eta$ 、 $\zeta$  分别为外生潜在变量与内生潜在变量矩阵。外生潜在变量矩阵  $\eta$  包含 5 个外生潜在变量, 分别是个体特征、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环保行为习惯, 其对应的观测变量集合  $x$  包含上文中所列的 19 个观测变量, 即  $x_{11}$ — $x_{17}$ 、 $x_{21}$ — $x_{24}$ 、 $x_{31}$ — $x_{32}$ 、 $x_{41}$ — $x_{43}$ 、 $x_{51}$ — $x_{53}$ 、 $x_{61}$ — $x_{63}$ 、 $x_{71}$ — $x_{72}$ 、 $x_{81}$ , 对应残差分别为  $e_{11}$ — $e_{17}$ 、 $e_{21}$ — $e_{24}$ 、 $e_{31}$ — $e_{32}$ 、 $e_{41}$ — $e_{43}$ 、 $e_{51}$ — $e_{53}$ 、 $e_{61}$ — $e_{63}$ 、 $e_{71}$ — $e_{72}$ 、 $e_{81}$ 。内生潜在变量矩阵  $\zeta$  包含 1 个内生潜在变量, 即中国农村居民福祉, 其对应的观测变量为农村居民幸福感, 对应残差为  $e_{91}$ 。 $\Lambda_x$  与  $\Lambda_y$  分别为观测变量  $X$ 、 $Y$  的因素负荷量矩阵,  $\delta$ 、 $\epsilon$  分别外、内生潜在变量测量模型的残差矩阵。 $B$ 、 $\Gamma$  分别表示内、外生潜在变量的系数矩阵,  $\zeta$  为结构模型残差,  $e_{90}$  为结构模型的测量误差。

### 4. 样本检验

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前, 要对本文所选的 25 个观测变量进行正态性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同时要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保障模型构建的适配性与精确性。

(1) 观测变量正态性检验。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观测变量必须服从大样本正态分布。经检验发现, 在所选取的观测变量中, 除文化程度、政治身份、家庭人均收入、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这 4 个变量外, 其余观测变量的峰度绝对值均小于 1.30, 偏度均小于 1.40, 并且均

值与中位数均较为接近, 满足正态分布特征。因此, 研究中剔除了数据未满足正态分布要求的这 4 个变量。

(2) 观测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根据系数矩阵检验结果, 剩余 21 个外生潜在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23, 表明经过筛选后的观测变量间并不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模型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良好。

(3) 验证性因素分析。剩余 21 个观测变量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除性别、年龄外, 其余观测变量的标准载荷量均位于  $[0.57, 0.86]$  区间内, 满足载荷量要求位于  $[0.5, 0.95]$  区间的检验标准; 性别、年龄对应的因子载荷量分别为  $-0.11$ 、 $-0.66$ , 因此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其余观测变量的多元相关的平方, 均大于 0.57, 满足信度系数应在 0.50 以上的标准, 模型内在质量检验良好。7 个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在 0.6 以上, 模型内在质量较佳。

## 四、中国农村居民多维福祉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与分析

### 1.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评价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需要考虑模型观测变量间的方差共变关系, 根据修正指标值小于 4 的临界标准, 增列  $e_{21}$  与  $e_{24}$ 、 $e_{22}$  与  $e_{62}$ 、 $e_{22}$  与  $e_{32}$ 、 $e_{14}$  与  $e_{52}$ 、 $e_{23}$  与  $e_{71}$ 、 $e_{23}$  与  $e_{31}$ 、 $e_{51}$  与  $e_{61}$ 、 $e_{31}$  与  $e_{61}$ 、 $e_{41}$  与  $e_{81}$ 、 $e_{52}$  与  $e_{72}$ 、 $e_{17}$  与  $e_{32}$  间 11 组共变关系, 从而降低卡方值, 增强结构方程的适配性。

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 绝对指标检验中, 卡方值  $\chi^2$  显著性、均方根残差 (RMR) 值、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SRMR) 值、良适性适配指标 (GFI) 值、调整后良适性适配指标 (AGFI) 值分别为 0.08、0.02、0.02、0.99、0.99; 增值适配度指数检验中, 非规范适配指标 (NNFI) 值、规范适配指数 (NFI) 值、相对适配指数 (RFI) 值、比较适配度指数 (CFI) 值分别为 0.99、0.97、0.95、0.99; 简约适配度指数检验中,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值、调整后的规范适配度指数 (PNFI) 值、临界样本数 (CN)、卡方值  $\chi^2$  自由度分别为 0.59、0.63、1625、1.35, 各项指标均在适配度良好要求的临界值范围内。赤池信息指标

(AIC)、一致化赤池信息指标 (CAIC) 均满足理论模型 < 饱和模型且理论模型 < 独立模型, 模型适配度整体评价良好。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见表 1) 表明, 除环保行为习惯与中国农村居民福祉间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 5% 外, 其他观测变量与其对应的潜在变量间以及潜在变量间的路径传导效应均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个体特征、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社会公平感评价、社会治理参与特征间协方差估计值均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性。因此, 模型选用的观测变量能够充分反映其对应的潜在变量。

## 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与分析

中国农村居民多维福祉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与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1) 个体特征的影响。个体特征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为 0.46, 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在个体特征潜在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中, 健康状况与家庭相对收入的因子载荷量分别为 0.64、0.67, 其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福祉具有积极影响, 证明“残疾悖论”在中国并不成立。<sup>[16]</sup> 家庭相对收入对农村居民福祉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结果, 印证了“伊斯特林悖论”中的“快乐水车”观点。<sup>[17]</sup>

(2)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为 0.12, 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应的观测变量中, 农村公共服务充足、分布、便利、普惠满意度评价的因子载荷量分别为 0.79、0.63、0.73、0.75, 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明公共服务的四方面评价对农村居民的相关满意度均具有重要影响。整体而言,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影响程度较低,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建设和完善尚存较大改进空间, 是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重要突破口。

(3) 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的潜在变量路径系数为 0.04, 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 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福祉存在正向影响。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潜在变量对

应的观测变量中, 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与对地

表 1 中国农村居民多维福祉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路径显著性水平
x2→Y	0.12	***
x3→Y	0.04	***
x4→Y	0.09	***
x5→Y	-0.01	**
x1→Y	0.46	***
x6→Y	0.06	***
x7→Y	0.39	***
x8→Y	0.03	***
测量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路径显著性
x14←x1	0.64	***
x17←x1	0.67	***
x21←x2	0.79	***
x22←x2	0.63	***
x23←x2	0.73	***
x24←x2	0.75	***
x31←x3	0.80	***
x32←x3	0.77	***
x41←x4	0.34	***
x42←x4	0.64	***
x51←x5	0.53	***
x52←x5	0.23	***
x53←x5	0.38	***
x61←x6	0.41	***
x62←x6	0.45	***
x63←x6	0.52	***
x71←x7	0.63	***
x72←x7	0.16	***
x81←x8	1	—

注: \*\*\*表示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统计水平上显著。

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的因子载荷量分别为 0.80、

0.77, 农村居民对两级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越高, 则其福祉水平越高。

(4) 社会资本特征的影响。社会资本特征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为 0.09, 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 社会资本特征对农村居民福祉存在正向影响。在对应的观测变量中, 社交串门频率变量的因子载荷量为 0.34, 小于亲朋关系密切程度的因子载荷量 0.64, 亲朋关系对社会资本特征起着决定性作用, 亲朋关系越密切、社交串门越频繁, 则农村居民的福祉水平越高。

(5) 环保行为习惯的影响。环保行为习惯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为 -0.01, 且在 5% 统计水平上显著, 环保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福祉存在负向影响。在对应的观测变量中, 垃圾分类、塑料袋回收利用、环保捐款变量的因子载荷量分别为 0.53、0.23、0.38, 即三者对福祉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5、-0.02、-0.04, 表明垃圾分类、塑料袋回收利用、环保捐款等环保行为习惯对样本农村居民福祉具有负向影响。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这一结果意味着, 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整体的环保行为水平较低, 不遵守环保行为准则的农村居民在人居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甚至破坏行为, 导致具有良好环保行为习惯的农村居民环保行为的实际收益小于预期收益, 由于这种心理落差的存在, 他们的福祉会被“搭便车”者甚至环境破坏者剥夺。优化农村居民特别是环境破坏者的环保行为习惯, 对于消除对具有良好环保行为习惯的农村居民的福祉剥夺具有重要意义。

(6) 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的影响。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为 0.06,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对农村居民福祉存在正向影响。对应的观测变量中, 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卫生监督协管满意度、农村危房改造满意度的因子载荷量分别为 0.41、0.45、0.52, 农村居民对民生事业建设的满意度越高, 其福祉水平越高。

(7) 社会公平感评价的影响。社会公平感评价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为 0.39,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社会公平感评价对农村居民福祉存在正向影响。对应的观测变量中, 社会公平评价的因子载荷量为 0.64, 大于收入分配公平评价的因子载荷量 0.34, 农

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 其福祉水平越高。

(8) 社会治理参与特征的影响。社会治理参与特征的路径系数为 0.03,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社会治理参与特征对农村居民福祉存在正向影响。基层民主选举参与率越高, 则农村居民的福祉水平越高。

(9) 整体福祉结构剖析与评价。“个体特征”、“社会公平感评价”对农村居民福祉影响能力较强;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治理参与特征”、“环保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能力依次减弱。中国福祉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治理参与特征”、“环保行为习惯”四个方面最为薄弱, 它们是中国政府未来在农村居民福祉建设工作中的重点。虽然社会公平感评价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存在较强影响, 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农村居民社会公平评价, 收入分配公平评价较低, 应该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 适度加强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 将更多的增收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 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提高它们的收入分配公平评价。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3 年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福祉结构进行了评价, 结论如下: “个体特征”、“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社会公平感评价”、“社会治理参与特征”对农村居民福祉具有正向影响, 环保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福祉存具有负向影响。其中, “个体特征”、“社会公平感评价”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程度最大,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资本特征”、“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治理参与特征”、“环保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能力依次减弱。除垃圾分类行为、塑料袋重复利用、环保捐款行为 3 个观测变量对农村居民福祉具有负向影响外, 其余观测变量对农村居民福祉均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

一,“民生事业建设满意度”、“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社会治理参与特征”、“环保行为习惯”在中国农村居民福祉结构中最为薄弱,它们是提高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重要突破口。第二,推进、完善九年义务教育、卫生监督协管、农村危房改造等民生工程,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第三,政府进一步增强环境治理力度,指引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借助福祉提升,增大农民参与环保的内生动力。第四,完善基层选举制度,并加强对基层选举过程的监督,让村委选举真正成为农民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培养农村居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第五,重视农民环保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使其形成良好的环保行为习惯,消除环保行为习惯对福祉水平的扭曲激励。第六,全面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公平性、便利性、普惠性,提高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增强这一满意度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积极影响。第七,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降低基尼系数,减弱相对剥夺效应,为农民增收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 参考文献:

- [1] [2] 王艳萍. 幸福经济学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17, (10).
- [3] Benjain, D. J. et al. Beyond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Toward well-being indices based on stated preference [J]. The American Economist, 2014, (09).
- [4] Bond, T. & K. Lang. Using happiness scales to inform policy: Strong words of caution [R]. VOX, CEPRs Policy Portal, 2014.
- [5] John P. Robinson and Phillip R. Shaver, Measure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Appendix B to Measure of Political Attitudes) [R]. Ann Arbor,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69.
- [6] [17] Richard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 In Paul A. David &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7] MacKerron, G. Happiness economics from 35,000 feet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1, (04).
- [8] 陈卓, 续竞秦, 吴伟光.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来自浙江省4县(市)的证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10).
- [9] 刘向东, 陶涛. 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幸福圈层理论”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 (05).
- [10] 徐仲安, 靳共元, 张晓林, 耿宇宁. 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四川省震后灾区与非灾区的对比[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 (04).
- [11] 陈明红.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与国民幸福感[J]. 农村经济, 2013, (11).
- [12] 白描, 吴国宝. 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 (01).
- [13] 聂鑫, 汪晗, 张安录.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多维福祉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 (04).
- [14] 李静, 王月金. 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10).
- [15] 陈文, 陈华. 成都地区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J]. 农村经济, 2013, (03).
- [16] Moller, D. Wealth, disability, and happiness [J].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011, (02).

责任编辑: 林涛  
校对: